

# 论山西抗战文学的特殊形态

王巧凤

山西文学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一直比较封闭。是抗日战争,点燃和助产了山西文学。战争打破了地域界线,外地作家、艺术家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本土作家、艺术家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催生和发展了山西的抗战文学。因此可以说,抗战烽火是山西文学得以新生的首要前提。

由于战争,转移了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的重心。“五四”时期基本上潜隐的救亡意识,因民族存亡之大事,激变为明确意义上的救亡意识。以往以启蒙为主体的文艺创作,开始升华为以救亡为主题的创作取向。也就是说,“五四”时期是以启蒙压倒了救亡,抗战时期救亡却压倒了启蒙。

这种重心的转移,对于山西抗战文学来说,大大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战火燃烧起来后,山西成了抗日的前哨,战争危及国家及民族命运,危及每个个体生存的命运。这时,山西人民尽管仍然没有走出原有生活规范和思维结构,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敌军压境的严酷现实,不仅使普通的山西百姓奋起救国,就是统治山西的国民党二战区长官阎锡山,也开始与共产党人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时期,民主气氛大为增强,人们的思想在相对和缓自由的氛围中,变得活跃而向上。于是,理想追求,文艺创作的局面有了变化。外来信息、文化营养,不断地传布到山西各个抗日根据地,文艺家借这一开放局势,大力宣传革命、宣传爱国思想,山西文学就在这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中,开始出现转型。救亡意识、人的意识、文化意识不断地冲击着山西知识者与广大农民的传统观念,冲击着山西古老的文化传统。逐渐地,山西抗战文学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文化品格。这一段的文学艺术创作,紧随时局变化,把残酷的血与火的战争,要求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反对侵略、反对压迫、反对封建思想的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转化为山西抗战文学的主旋律,刺激和影响人们对新局势的判断与选择。尤其是在最严峻的敌我相峙阶段,战争要求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宣扬,更多的变成了一切服从于民族革命斗争及其铁的纪律、统一意志和团结的威力。任何个人的权利、自由、追求,都让位于民族的、国家的需要。文艺服从于政治,文学为战争服务,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那个时候,人们被时代、战争、政治裹挟,不由自主地便失却了自己,衍生出许多无奈和缺憾。比如,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革命要求和现实斗争,一定程度地掩盖和湮没了“五四”新文学曾竭力倡导的启蒙思想。又比如,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

体主义世界观和行为规范来取代封建性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一些东西却又在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人们的头脑。还有当时的平均主义，家长制作风，时而出现的“一言堂”现象，仍然流露的尊卑秩序与等级观念，以及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同程度的排拒……随着这场“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社会以及知识者中逐渐蔓延开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意识。这些积弊在当时确实很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山西抗战文学的发展。但在那时的救亡热潮中，到处都被一种轰轰烈烈的声势和艰苦抗战的气氛所包围，人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那么，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再所难免，正如评论家赵园所指出的，鲁迅如果不是在战争年代，也不会去做杂文，而放弃了他一直想写的有关四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老舍也不会去写大鼓词，茅盾又何至于去写《霜叶红似二月花》。

无论怎样说，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山西抗战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剖析，连同各种积弊的滋生，都脱不开民族生存的救亡现实土壤。这现实，使山西抗战文学无法冷漠地超然于政治与战争的双重救亡主题之外，那么，其优劣得失也就难以选择。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农民战争的一种宿命。

就总体而言，抗战以及救亡意识的强化，最终还是使山西抗战文学日渐成熟起来了。

战争使许多文学艺术家奔赴前线，贴近农民，深入到生活基层，体察到战争与民情的真情实况。外来文艺家与本地文艺家，都把文艺同民族命运联结在一起，把迅速、及时地反映抗战，服务于抗战，为国为民分忧解难，当作创作的“天职”与使命。打仗、参军、抓汉奸，颂扬民族牺牲精神，宣传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成为当时诗歌、小说、戏剧、报告文学创作最突出的共同内容。抗战进行到深入与反攻阶段，山西抗战文学也随之拓展到军民团结、政权建设、反封建意识、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反顽斗争、敌区工作等各个领域与不同层面。丁玲、周而复、阮章竞、田间、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高沐鸿、贾植芳、姚青苗、碧野、冈夫等作家，曾用他们那支永不停息的笔，谱写了一曲曲激扬正气的救亡之歌。

那个时期，不论外来作家还是山西作家，最强的向心力在于“救亡”。围绕这一突出的社会主题，无论从哪里来的作家，无论从前已形成何种艺术个性，在“救亡”这一口号下，都抹去了界限，抹去了差别，抹去了不适应与不习惯。那个时候，山西根据地也曾展开过“大众化问题”、“形式问题”、“暴露黑暗问题”等方面的讨论与研究，但是，不同地域作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比较融洽的、和谐的，创作倾向始终是比较统一的。是“救亡”这一中心把大家团结起来的，否则，很难有如此和谐统一的局面。根据地作家们就在那种马不停蹄，头不落枕的战斗生活中，仍然写出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戏剧，把山西人民抗战业绩传播到大后方和全国各个抗战区去。

外来作家对于山西抗战文学的影响、渗透，不仅有助于山西文学的重新建构，而且引起了山西作家对山西文学价值、意义的追问和开拓。山西作家们也许是在对异质文学创作的比较、模仿、学习、反思、重新认识之下，产生了对于原有文学观念的更新，艺术角度的选择，感悟方式的转换，对传统的山西文学重新认识、重新发掘的理性意识。赵树理就是一个典型。“五四”新文学之于他，一方面是对鲁迅、郭沫若这些大家怀有崇拜之感，另一方面就是在欧化热潮中模仿欧化，写欧化小说。那时，赵树理想必以为“五四”新文学的

“新”，就在于对欧化的学习、运用、掌握。但在抗日战争中，外地作家与本土作家的融合，使赵树理真正理解了欧化小说并不是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不要说欧化小说，就是把鲁迅的小说读给他略通文墨的父亲时，他父亲也根本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要说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了。正是在这种对民众审美接受能力的认真考察以及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赵树理意识到，抗战这一救亡主题，把外地与本地作家间的距离拉近了，同时也把“五四”新文学与山西抗战文学的距离拉近了。“五四”时期略具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提倡大众化方向，但当时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个方向。而在战火纷飞的山西抗日根据地，在外地作家与本地作家合力浇灌山西文化园地，在本地作家全力适应农民阅读欣赏能力的努力中，“大众化”方向却得以实现。于是他身体力行，使之臻于完善。

这说明，山西文学需要外地作家带来的文化营养，同时也需要本地作家根据山西文化特点兼收并蓄。利用外地文化与全国抗战文学取得一致的语言形式和艺术技巧，并不非得抛弃传统文化，全盘照搬外地经验、牺牲本地个性为代价；恰恰相反，应该以符合中国农民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事实上，抗战时期，山西作家对外地作家的学习，以及外地与本地作家呈现的联合与影响，完全是一种时代的迫切要求，带有历史的必然性。战争的外紧内松，使外地作家与本地作家，作家与农民、士兵，有了共同面对文学、欣赏文学、再造文学的机缘。只因了这机缘，才产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性“对话”。尽管这对话是以“救亡”为中心，但同时已经包含了“五四”时期，揭露国民性弱点和“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思想在内。“五四”和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觉醒中的特殊地位和中国农民在革命斗争中觉醒的特殊重要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文学表现和反映的中心人物都应该是知识分子和农民。那么，山西抗战文学对于知识分子和农民以及二者关系的关注与重视，就带有了某种必然性。由这种必然性透露出，山西抗战文学，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与救亡主题、知识分子与农民命运的主题、作家队伍的团结融合、真正实现文学大众化方向的一种延续，一种持续性的新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山西抗战时期的外地作家与本土作家之间、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对话”，对于山西抗战文学，就具有了一种深远的意义与影响，它似乎成为“五四”倡导期文学的一种回应，深深镌刻在了山西抗战文学史上。

（作者：王巧凤 太原师专中文系 030001）

〔责任编辑 马斗全〕